

美国网络中介者的 诽谤责任与免责规范初探

——以《通讯端正法》第 230 条及其司法适用为中心

张金玺

内容提要 当网络空间中出现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时，如何适度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各国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网络诽谤与传统环境中的诽谤不同，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受害人往往无法追诉诽谤言论的原始表达者，而参与网络信息传播的网络中介者是否应承担以及如何承担侵权责任，是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本文试图探讨美国立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与美国法院的相关司法见解，并对目前美国法院对网络中介者提供近乎绝对的免责保护做出批评检讨，强调在网络诽谤案件中亦应适度保护名誉权利益。

关键词 网络中介者 诽谤 “好撒玛利亚人”条款

诽谤法致力于协调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对双方利益的全面考量与兼筹并顾，以期臻于适切平衡，不致顾此失彼。具体调和机制，在不同国家，因社会背景与法律传统相异，各有其建置，兹不具论，惟各国在互联网时代悉皆面临一项共同课题：传统诽谤法如何因应互联网新媒体勃兴所伴随之新问题？现实世界的法律规范如何适度导入互联网，以处理网络活动引发的名誉侵权纠纷？

互联网所独有的自由开放特性，一方面极大提升了个人的表达能力，对推进言论自由大有裨益，但另一方面，人人皆可发言，网络言论因缺乏把关机制而几近毫无限制，难免良莠不齐、金石杂陈，其中不当贬损他人名誉而造成网络诽谤的情形，所在多有。由于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即时性、全球性、匿名性等特性，此类案件对诽谤法的传统架构提出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网络言论的匿名性与难以溯源性，受害人殊难追究诽谤陈述的原始发表者，于此情形下，参与信息传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网络中介者（intermediaries）是否应为出自第三人的诽谤信息负责，如何负责？

就前揭问题,究竟是直接适用实体世界内形成的既有规则,还是根据互联网之特点而作适当修正,又或是再造全新规则?各国立法各有其应对思维。在美国,国会在1996年《通讯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简称CDA)第230条中,特别针对网络中介者明定责任规则。之后围绕CDA第230条展开的司法解释明显越出传统规则的常轨,赋予网络中介者全面免责权,表达出迎合互联网产业发展与偏重言论自由的取径。本文尝试对CDA第230条与相关判例为初步探论,研析其立法背景与论理思路,检讨其缺点疏失,以期为国人思考研究提供一种借镜与参考。

在进入正文之前,须先就概念做一点说明:本文所称“网络中介者”,指介于直接侵权人(即诽谤言论的发表者)与被侵权人之间,未参与诽谤信息的制作,但在其传播中发挥一定作用,并有能力限制其访问,因此可能被追究诽谤责任的网络中介角色。依CDA第230条的规定,“网络中介者”包括:(1)交互性计算机服务(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的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接入、缓存、信息存储、搜索工具等服务,主要指互联网服务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1〕此类网络中介者是网络诽谤案的主要被告,故为本文关注的重点。(2)交互性计算机服务的使用者。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简称ICP)在内的互联网服务用户也可能因转载、链接他人诽谤言论而引发中介者责任的问题,从而提出司法实务上的考验。最后须说明的是,网络由实体层(physical layer)、逻辑层(logical layer)和内容层(content layer)三个层次建构,分别对应实体网络、软件及应用服务、信息内容。本文界定的网络中介者存在于逻辑层与内容层,不包括实体层的硬件架设者。电话公司等基础设备服务商向来属于“公共载具”(common carriers),仅提供物理性的传输管道,技术上难以检视或阻止特定信息,不必对诽谤内容负责,故非属争议事项,不在本文研究范畴之内。

一、传统诽谤法规则及其司法适用

自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2〕以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为普通法注入宪法精神,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情状中要求名誉权对言论自由做出适当退让,而在无关公益的私人诽谤中则强调名誉权保护。其特征是以原告身份为主要标准区分案件类型,并异其归责原则,形构成阶梯式的归责体系。大体而言,政府官员与公众人物原告适用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原则,须以“确实清楚”的证据证明,被告在发表诽谤言论时明知所言不实或全然不顾事实真伪。而普通私人在诉请救济时,一般只须证明被告有过失,仅个别州要求证明重大过失或实际恶意。〔3〕

据此,《侵权法重述(二)》(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归纳诽谤责任的成立要件为:(1)系争言论为指向特定对象的诽谤性不实陈述;(2)向第三人传述公开,且无特许权可资援引;(3)被告至少具有过失以上之过错;(4)肇致特别损

害,或存在不需证明特别损害之事由。^[4]

我们所熟悉的上述诽谤法规则,在互联网情境中并未被颠覆,不过,其适用对象是系争言论的表达者(speaker)与出版者(publisher)。而根据传统诽谤法,系争言论的散布者(distributor)作为诽谤被告,所适用的责任标准存在差异。

出版者与散布者的区分,主要是基于传播者对传播内容是否具有“编辑控制”(editorial control)的权能。出版者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以其自有载体发布信息,对所发表内容有完全的编辑控制权,并主导内容生产,自当对其过错致生的诽谤损害承担责任。“即令重复他人言论,亦与原始表达者负同等责任。”^[5]而散布者,如书店、图书馆、报摊等,仅为信息的传递者,对所传布内容甚少或全无编辑控制,通常不必为他人的诽谤言论负责。仅当散布者明知或有理由应知所传递内容的诽谤性质时,始有可能负法律上责任。^[6]

由此可见,出版者责任相对重于散布者责任。差异的关键在于原告的举证责任,若诽谤被告为出版者,原告无须证明被告知悉系争陈述的内容。若诽谤被告为散布者,原告须先证明被告对系争陈述的内容已知情或应知情。此点一经证明,散布者即适用与出版者相同的诽谤法规则,在侵权责任的后续认定上并无二致。

之所以区别出版者责任和散布者责任,并适当减轻散布者责任,目的在于促进公共领域内信息的自由流通,增强公众近用信息的能力。美国最高法院在1959年“史密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Smith v. California)^[7]中特别指出,要求散布者承担与出版者相同的责任势必造成自我审查,“每一位书商将被迫知悉书店内每一本书的内容,要求书商达到此种全知,全然不合情理。书商之负担将成为公众之负担,盖因限制书商即为限制公众对读物的获取。设若书店与报摊之经营范围囿于经其所有者审核查验的内容,则可售材料之数量难免锐减。……书商在州政府压迫下采行的自我限制,将演变成为影响全体公众的审查制,为祸之烈,不会因该种审查之私人性质而稍有所减。”^[8]

出版者-散布者之界分法在传统媒体环境中适用良好,但移植于互联网时,却可能遭遇一定困难,因为网络中介者(尤其是ISP)的身份究为出版者抑或传布者,易于出现认定上的分歧。在1996年CDA第230条生效之前,美国法院试图以传统架构认定ISP的身份,最能表达实务见解的,当属以下两起判例:

判例一:1991年“Cubby公司诉CompuServe公司案”(Cubby, Inc. v. CompuServe, Inc.)^[9]

被告CompuServe公司营运网络论坛、电子布告板、互动式在线会议、主题数据库等互联网服务,因用户在论坛上张贴涉嫌妨害原告名誉的言论而被起诉诽谤。^[10]原告主张对被告绳之以出版者责任,但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认定被告为散布者。法院指出,CompuServe经营的产品实为营利性电子图书馆,即通过为用户传送大量电子出版物以收取使用费与会员费。尽管CompuServe可以拒绝传送某特定出版物,但一旦决定传送,便对其内容几无编辑控制权。并且,发布本案系争言论的论坛事

实上由与 CompuServe 订立合约的第三人管理,被告显无插手之机。于此情形下,CompuServe 对所发送内容的编辑控制,无异于图书馆、书店或书报摊,期待它一一审查所传送的出版物并过滤诽谤陈述不仅不现实,而且违离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旨。^[11]基于以上论证,法院认为,应对 CompuServe 适用散布者责任标准,仅当被告明知或应知诽谤内容时,始得追究其诽谤责任。^[12]又鉴于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被告对诽谤内容已知情或应知情,法院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即决裁判。^[13]

判例二:1995 年“斯特拉顿·奥克蒙特诉神童服务公司案”(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14]

Cubby 案之后,对 ISP 适用散布者责任似已成为司法实务界的通行观点,但“斯特拉顿·奥克蒙特诉神童服务公司案”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些情形下,ISP 也可被视为出版者。

1994 年 10 月,某匿名用户在神童公司运营的电子布告栏上张贴涉嫌诽谤斯特拉顿·奥克蒙特投资银行的信息,因无法追查原始作者,该投资银行起诉神童公司诽谤。本案核心争点为:神童公司对电子公告栏所实施的编辑控制,是否足以认定其为出版者,须承担与报社相同的责任?^[15]两造就此争点针锋相对,最终,纽约州最高法院同意原告主张,认定被告为出版者。依据是:(1)神童公司曾对外承诺,将对电子布告栏所登载之内容善加管理;(2)该公司确实从事内容管控,如安设自动软件过滤系统,发布“内容规则”并嘱其用户遵守,延聘管理员实施内容监控等。法院据此认为,神童公司积极采用科技与人力删除冒犯性、低品位信息,显然是对内容做出判断,而此种判断构成编辑控制。^[16]

法院特别强调,它完全同意 Cubby 案判决,也认同电子公告栏一般应被视同于书店、图书馆等散布者,但神童公司的政策、技术与人事决策已改变其角色定位,令该院不得不认定其为出版者。^[17]法院推测,神童公司之所以涉入内容管理,部分是为了以“面向家庭”之形象吸引用户,以示区别于竞争者,既然受惠于编辑控制,便须承担随之而来的更高的法律责任。^[18]

总此以言,在 CDA 通过之前,美国法院对 ISP 等网络中介者一体采用传统规则,即依被告对所传播内容的编辑控制程度区分为出版者与散布者:对内容无编辑控制或极少编辑控制者,以散布者待之;对内容保持实质性编辑控制(即令不完全)者,以出版者责任待之。以上标准显然将 ISP 的编辑控制等同于传统媒体的编辑控制,从而产生同样的法律效果。但事实上,二者行使编辑控制的方式与范围迥然有异,网络上的信息流量远远超出传统媒体,无论采用自动过滤技术还是人工审查机制,在审查范围与细致程度上,ISP 均无法比拟于传统媒体。令人担心的是,若按以上标准,ISP 将倾向于放弃对不当信息的管理以求自保,因积极干预极可能蹈险,不闻不问则可绕避出版者责任。这成为 CDA 日后为 ISP 等网络中介者专设免责条款的原因之一。

二、“好撒玛利亚人”条款

1996年,《通讯端正法》作为《电讯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的一部分,由国会通过,经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旨在限制未成年人经由远程电子通讯管道接触淫秽或不雅材料,绝大部分条款因对言论内容限制过严,不久即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19]但CDA第230条经受住了宪法审查,被称为“网络空间内最重要且最成功的立法条文之一”,^[20]尤其在网络诽谤案件中适用广泛。

CDA第230条(c)款就网络中介者做出免责规定,命名为“保护‘好撒玛利亚人’阻断与过滤冒犯性材料”条款,一般称为“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条款。^[21]具体规定如下:

(c)(1)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不可被视作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所提供信息的出版者或发表者。

(c)(2)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有下列情事者,无须承担民事责任:

(A)自愿且善意地限制访问或限制获取其所认定的淫秽、猥亵、色情、下流、暴力、骚扰或其他不当信息。此等材料是否受宪法保护,在所不论。

(B)向信息内容提供者或他人提供技术手段,以便其限制访问(A)所叙及之材料。^[22]

另依CDA第230(f)(2)之规定,“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指“支持、协助多用户访问计算机服务器的信息服务、系统或访问软件提供者,特别是支持用户访问互联网的服务或系统,以及由图书馆或教育机构运营的系统或提供的服务”。^[23]依CDA第230(f)(3)之规定,“信息内容提供者”(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指“对于经由互联网或其他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的信息,在制作(creation)或发展(development)上负有完全或部分责任的个人或实体”。^[24]

作为一项免责条款,“好撒玛利亚人”条款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模糊和笼统的问题,免责限制条件(享有免责效果所需符合的要件)与免责范围(可免除的责任类型)规定得十分模糊,给法院预留了相当大的解释空间,造成日后理解与适用上的困难与分歧。该条款内容中可能引发争议的地方有以下三处:^[25]

第一,CDA第230(c)(1)的大意是: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与用户,不必为他人制作或发展的诽谤性言论承担出版者或发表者责任。由此产生一项免责限制条件:作为网络中介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用户,自身不能参与诽谤性言论的制作或发展,一旦参与,即成为“信息内容提供者”,无法豁免于发表者或出版者责任。但是,何为“制作或发展”?“制作或发展”与“编辑、修改”之间的界限何在?立法欠缺说明。此外,在第三方信息的网络传递过程中,网络中介者涉入的程度深浅有别,性质上也有所差异:有时仅仅是单纯充当信息传输管道与发布空间;

有时则是主动提供信息的链接甚至转发信息；抑有进者，可能出现网络中介者与第三方通过合同约定，由第三方特别提供信息内容供网络中介者发布的情况。是否在上述各类情形下，网络中介者皆可免除出版者责任？我们无法从立法条文中得到答案。

第二，CDA 第 230 (c) (1) 对免责范围的规定也有暧昧不清之处。虽明确免除网络中介者的“出版者”与“表意人”责任，但是否同时免除“散布者”责任，未予明示。此后的司法实务表明，该处空白可作两种理解：其一，条文中有意不提“散布者”，说明国会仅免除出版者责任，仍保留传统诽谤法中的散布者责任。若网络中介者明知或应知诽谤内容，即可按照散布者身份追究其责任；其二，“出版者”概念有广、狭之分，传统诽谤法中与散布者相对的是“狭义的出版者”，而“广义的出版者”可同时涵摄“狭义的出版者”与散布者。这种见解认为，对 CDA 第 230 (c) (1) 中的“出版者”一词应采广义理解，故免责范围兼及散布者责任。二者何为确解，日后成为两造在诉讼上争执的重点，美国的学界与司法界在此问题上也严重分裂，学界多采第一种理解法，而法院偏重第二种理解。

第三，CDA 第 230 (c) (2) 规定，网络中介者在自愿与善意的前提下，无须为采取预先措施限制他人访问、获取不当材料或提供过滤技术等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的疑义在于，此处所谓“民事责任”所指为何？是因擅自删除用户的信息而产生违约责任（违反与用户订立的服务合同）？抑或因实施编辑控制而需以“出版者”身份为第三人侵权信息承担侵权责任？前者是针对言论发表者的责任，后者是针对被侵权人的责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责任。若采第一种理解，则 CDA 第 230 (c) (2) 与诽谤等侵权问题无关。若采第二种理解，则意味着 CDA 第 230 (c) (2) 是对 CDA 第 230 (c) (1) 的补充，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CDA 第 230 (c) (2) 是否又提出了一项免责限制条件？具体而言，网络中介者是否必须有筛选、限制不当材料的“善行”，始得享受“好撒玛利亚人”的免责保护，如若不然，即应除外于免责范围？如果答案为肯定，那么显然，对传输内容保持中立的散布者无法享受免责保护。当然，还有第三种理解，即以上两种理解的合并，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统统包括在所免除的民事责任范围之内，此种理解因同样涉及侵权责任，也存在第二种理解可能产生的问题。

“好撒玛利亚人”条款本身的诸多模糊、不确定之处，为法院未来的扩张性解释预备了宽广的空间。之所以会产生理解上的模棱两可，究其原因，除了立法技术上的粗疏以外，立法目的内部的不一致也值得检讨。

从立法背景与立法政策分析，CDA 第 230 条的立法目的有二：（1）鼓励网络中介者对第三人信息积极从事内容管理，主动限制淫秽、色情等不当信息，以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同时推进网络中介者开发并提供信息过滤技术，以助为人父母者筛除不当信息。这一目的与 CDA 限制淫秽色情内容的整体立法目的是协调一致的。《众

议院〈电讯法〉会议报告》(House Conference Report on Telecommunications Act)曾对此有明确表述:“本条款的特定目的之一,在于推翻‘斯特拉顿·奥克蒙特诉神童服务公司案’与其他类似案例,它们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及其用户限制访问不当信息,便将其视为第三人信息的出版者或发表者。与会者认为,此等案例会严重阻碍一项重要联邦政策的实现,即赋权于为人父母者自行判断其子女可通过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接收何种传播内容。”^[26] (2)立法者追求的第二项政策目标是推进互联网产业的持续发展,确保自由市场的竞争与生机不受联邦及州政府摧折。^[27] CDA第230(a)揭明,美国国会认为,互联网与其他交互式计算机服务对国人而言,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教育与信息资源,可为多元化政治讨论构筑平台,为文化发展创造机会,为智识活动提供通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经由交互式服务获取政治、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最低程度的政府管制最能惠泽全体国人。^[28] 以上两项立法目的之间潜藏着深层矛盾,前者旨在激励网络中介者代替政府阻绝政府不乐见却又无法合宪禁止的言论,后者则以包容多元言论为出发点与追求,二者都涉及言论自由的意涵,方向却正好相反。

双重立法目的之复杂性与矛盾性正是造成条文理解分歧的深层根源所在。若严格依照第一项立法目的解释CDA第230(c),则“好撒玛利亚人”条款自然只应解除好撒玛利亚人的后顾之忧,免责对象应仅限于主动过滤不当内容的网络中介者,以确保“好撒玛利亚人”无虞于其编辑行为可能引发的出版者责任。相反,若依第二项立法目的解释CDA第230(c),则免责对象和免责范围还可大幅度扩张,因为免责越彻底、全面,便越少政府管制,越有利于促进互联网与其他交互式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壮大。之后的司法裁判实务表明,美国法院正是从第二项立法目的中滋生出对网络中介者近乎绝对的免责保护。

三、“好撒玛利亚人”条款的扩张适用

美国最高法院至今未审理过有关网络诽谤与“好撒玛利亚人”条款的案件,故目前只能从下级法院的判例中总结重要规则。经案例分析可知,下级法院对“好撒玛利亚人”条款几乎一边倒地采行扩张解释,免责范围一再放大,而免责限制条件一再收缩。兹选取最关键的几起案例,具体说明下级法院扩张适用“好撒玛利亚人”条款的趋势。

(一) 1997年“齐伦诉美国在线案”(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29]

此为适用“好撒玛利亚人”条款的第一例,也是迄今为止对该条款最具影响力的司法解释,一切关涉CDA第230条的案件皆无法回避本案。循其例,美国绝大多数法院将“好撒玛利亚人”条款的免责范围由出版者责任延伸至散布者责任。

本案案情如下:1995年4月25日,美国在线(后简称AOL)一匿名用户假借肯尼思·齐伦(Kenneth Zeran)之名义,在电子布告栏中张贴信息,兜售一款T恤

衫,其前胸印有关于数日前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恐怖炸弹袭击事件的低俗标语。信息内附有齐伦的电话,提示有意购买者联络此号码。嗣后,齐伦接到大量愤怒来电,甚至死亡威胁。他致电 AOL 通报情况,AOL 移除了诽谤信息,但拒绝发布撤回声明。翌日,类似信息再度出现,此后数日,匿名者在 AOL 上再三再四发布信息,齐伦不得不反复电告 AOL。^[30]

1996 年 4 月,齐伦起诉 AOL 诽谤,诉称 AOL 自得知有匿名第三人藉由其服务实行恶作剧始,即有责任立即移除诽谤信息、通知全体用户该信息虚伪不实,并有效防止相关材料再度发布。AOL 则引据 CDA 第 230 条,向法院主张免责。AOL 辩称,国会已规定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业者可免因第三人信息受诽谤追诉。^[31]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支持 AOL 的主张,驳回齐伦的诉求,齐伦上诉。^[32]

本案的核心争点是,CDA 第 230 条的免责范围是否仅限于出版者责任,抑或引伸及于散布者责任?齐伦主张,CDA 第 230 条仅规定 ISP 不需为第三人信息负出版者或发表者责任,但并未免除其散布者责任,兼之 AOL 在接获通知并明知侵权事实存在后,仍容许相同的诽谤信息一再出现,可见未能善尽注意义务,应负散布者的责任。^[33]受理本案上诉的第四巡回区美国上诉法院以齐伦的上述主张违逆 CDA 第 230 条立法精神为由,维持原审判决。该院认为,CDA 第 230 条的目的在于维护互联网传播的自由开放,将政府干预控制在最低限度。^[34]在如此丰富多元的网络空间内,如不能给予 ISP 充分的免责权,则侵权责任之威胁势必引发寒蝉效应,导致信息数量与类型高度受限。^[35]该院因此决定对“好撒玛利亚人”条款采行扩张解释,将“散布者”作为“出版者”之一部分,一并纳入避风港,判决书阐明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尽管诽谤法有出版者、散布者之分,适用责任标准高低有别,但从大处着眼,传统所谓之出版者与散布者,皆可归摄于广义的出版者型类之下。ISP 一旦收到诽谤投诉,事实上即被投入传统出版者的角色型态,必须决断是否发表、编辑或撤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齐伦所欲加诸 AOL 的责任,正是 CDA 第 230 条特别免除的出版者责任。^[36]

第二,散布者责任与 CDA 第 230 条促进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立法目的相悖。在散布者责任的框架下,每一次诽谤通知对 ISP 而言,都意味着责任风险。每一次通知都要求 ISP 开展细致又迅捷的调查,对信息的诽谤性质下法律判断,对是否蹈险允许信息继续发布快速做出编辑决策。这种要求对传统印刷媒体而言可能是现实的,但虑及互动计算机服务所传输的海量信息,在互联网语境下显然是无法承受之重。ISP 将因此面临永无止息的选择:或压制争议性言论,或承受侵权风险。^[37]

基于以上论理,第四巡回区上诉法院提出:传递第三人信息的网络中介者可同时豁免于出版者责任与散布者责任,即令明知或应知第三人藉由其服务发表诽谤信息,亦得主张免责。从此,网络中介者在诽谤纠纷中近乎处于完全无责的地位。

(二) 1998 年“布卢门撒尔诉美国在线案”(Blumenthal v. American Online Inc.)^[38]

1997 年 8 月 10 日, 热衷于挖掘华府八卦丑闻的 马特·德拉吉 (Matt Drudge) 在互联网专栏“德拉吉报告”(Drudge Report) 上爆料称, 新晋白宫总统助理 悉尼·布卢门撒尔 (Sidney Blumenthal) 有虐妻史。^[39] AOL 因涉入“德拉吉报告”的传播, 遭布卢门撒尔起诉诽谤。^[40] AOL 再度援引 CDA 第 230 条为辩,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做出有利于 AOL 的即决裁判。

本案中, VOL 不再是消极传输信息的中介者, 它与德拉吉订有一年期协议, 由德拉吉将每期“德拉吉报告”电邮至 VOL, VOL 主动将之张贴在服务器上, 供用户访问, 并每月支付德拉吉 3000 美元作为“版税”报偿。协议中还规定, VOL 有权移除“德拉吉报告”中违反其服务条款的内容, 并要求德拉吉做出合理修改。相较于由匿名用户发布的海量信息, “德拉吉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十分有限, 完全在 AOL 查验核实的能力之内。此外, VOL 还曾特别发布题为“AOL 聘用八卦专栏大王马特·德拉吉”的新闻稿, 将双方合作事宜广为宣传, 足证二者关系密切。种种等等, 皆表明 VOL 既非如齐伦案中般被动传输信息, 亦非如神童公司般积极筛选不当信息而尤有遗漏。VOL 明知“德拉吉报告”为八卦流言专栏, 仍主动张贴并推广, 它与德拉吉的关系, 似更接近于传统出版商与作者的关系。原告据此反对 AOL 适用 CDA 第 230 条的免责规定。^[41]

法院对原告的上述论证表示认同, 它承认, 若无 CDA 第 230 条之免责规定, 该院将支持原告的主张, 对 AOL 适用出版者责任标准, 或退一步言, 至少适用散布者责任标准, 方显公平。但法院同时无奈指出, 国会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 依 CDA 第 230 条,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者在传播由他人制作的内容时, 即令充任积极, 乃至进攻性 (aggressive) 的角色, 亦得享有免责保护。国会订立免责条款, 虽意在激励 ISP 自行审查淫秽等冒犯性材料, 但即令 ISP 自律不成功, 甚至根本无自律之努力, 亦不会因此丧失免责保护。^[42]

布卢门撒尔案从另一个方向扩张了“好撒玛利亚人”条款的适用范围。在本案中, AOL 在诽谤信息的发布中表现出主动、积极, 甚至“进攻性”的姿态, 它的身份明显不符合自律而负责的“好撒玛利亚人”角色, 它不仅没有开展自律,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 从事的是一种与自律背道而驰的行为。但法院认为, 根据 CDA 第 230 条, 只要网络中介者不介入信息的制作与发展 (即不是 CDA 第 230 (f) (3) 所界定的“信息内容提供者”), 则不论它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何种作用与影响, 积极也好, 消极也罢, 皆可免于出版者与散布者责任。

(三) 2003 年“巴策尔诉史密斯案”(Batzel v. Smith)^[43]

本案将 CDA 第 230 条的免责对象由 ISP 扩展至网络用户, 并试图阐明, 何为“信息内容提供者”对信息的“制作或发展”。

本案被告之一 罗伯特·史密斯 (Robert Smith) 是原告 艾伦·巴策尔 (Ellen

Batzel) 家中的修理工。他称巴策尔曾亲口透露, 自己是希特勒某亲随的孙女, 且家中陈设之部分画作为继承所得。史密斯见这些画作古老而富欧洲风格, 怀疑是纳粹在二战中劫掠所得, 遂上网搜索有关失窃艺术品的网站, 并以电子邮件向博物馆安全网 (Museum Security Network) 表出忧心。史密斯在邮件末尾写道: “欲讨论此事, 望电邮联系。” 本案另一被告, 博物馆安全网的运营者汤姆·克里默斯 (Tom Cremers) 将此封邮件略作文字修改, 刊登于网站之上, 并同时发送给电子邮件列表服务的所有用户。巴策尔得知后起诉诽谤, 称其从未自称纳粹党魁后裔, 亦未曾继承任何艺术品。史密斯则表示, 他未料到邮件会被公开发布, 早知如此, 必定不会发出邮件。^[44]

受理本案上诉的第九巡回区美国上诉法院力图阐明以下争点:

第一, CDA 第 230 条免责权是否仅适用于 ISP? 本案初审法院拒绝对博物馆安全网适用免责权, 因该网站非属 ISP。上诉法院反对如此解读 CDA 第 230 条, 该院指出, CDA 第 230 (c) (1) 明确规定, 免责权不止覆盖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 也兼及此等服务的“使用者”。博物馆安全网使用互动式计算机服务发送电子邮件, 编辑网站内容, 应属使用者无疑, 可适用免责权。^[45]

根据以上确认, 不仅 ISP 在传输第三人信息时享有免责权, ICP 也可依照相同规则享有免责权, 因 ICP 通过交互式计算机服务在互联网上提供内容, 也是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用户。此外, 这一判例在 Web 2.0 时代尤为重要。在以“使用者参与”为首要特征的 Web 2.0 时代, 博客博主、社交网站用户等网络使用者因转载他人言论, 或因他人在其页面上评论或留言而被起诉诽谤的可能性日增。依巴策尔案, 这些网络用户皆可援引 CDA 第 230 条加以免责。^[46]当然, 此种扩展适用是否合理, 尚有可议之处。

第二, 被告克里默斯对电子邮件所做的修改是否构成“制作或发展”, 从而可将其认定为“信息内容提供者”, 除处于责任豁免? 上诉法院认为, 克里默斯的文字修改尚未达到“发展”的地步, 所谓“发展”, 应比局部内容编辑与材料选择更具实质性。CDA 第 230 条意在鼓励网络中介者从事编辑管理, 有鉴于此, 网络中介者选择发表材料, 并在保留其基本信息与形式的前提下从事编辑工作, 不应构成“制作与发展”。^[47]

第三, 未经同意发布他人言论是否可享受免责权保护? 上诉法院认为此时不应适用 CDA 第 230 条, 因为明知或应知第三人无意将言论公之于众, 仍自作主张逕行发布, 会挫伤第三人日后使用电子邮件的信心, 不利于言论自由, 此种情况迥异于第三人主动张贴信息。至于如何评判被告是否明知或应知第三人的发表意愿, 法院提出“理性认知标准”, 即以理性人之认知水平, 可否认定第三方有发表意愿, 若其然, 则免除其责任, 否则不得免责。^[48]法院认为, 本案相关事实尚不明朗, 故发回加州中区美国地区法院重审。^[49]案件返回地区法院后, 克里默斯申请即决裁判, 法

院鉴于巴策尔另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区提起的相同诉讼已被驳回,故依“一事不再理原则”(res judicata)^[50]批准克里默斯的申请,原告巴策尔不得再次起诉。^[51]

(四) 总结

以上案例大致勾勒出美国法院对 CDA 第 230 条采行扩张解释的主流见解。^[52]结合其他相关案例,可归纳具体规则如下:

1. 网络中介者无须为第三人诽谤信息负出版者或散布者责任,即令收到侵权通知后未能移除诽谤内容,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亚利桑那州 2007 年的一起案例表明,甚至连网络中介者拒绝原始作者删除诽谤言论的请求,也不会令免责保护失效。^[53]

2. 网络中介者在第三人信息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一般不影响免责条款的适用。不论网络中介者是消极承载或传输信息,还是积极投入,如主动张贴或转载、^[54]提供搜索服务与链接,^[55]编辑、修改诽谤信息,^[56]乃至以“进攻性”的方式介入诽谤信息传播,皆可免责。

3. 免责对象至为宽泛,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与用户均可主张免责保护。ISP 与 ICP 在传播第三人侵权信息时享受同等的免责保护。

4. 惟有以下两种情形不得免责:(1) 网络中介者对信息内容的介入达到“制作或发展”的程度;(2) 不经原始作者同意直接发布信息。目前看来,法院对“制作和发展”的解释颇为严格。只要信息的“实质内容”由第三人提供,则网络中介者实施的选择、编辑、修改等行为皆不构成“制作和发展”。^[57]惟一的例外是,当网络中介者以非法问题教唆或强制用户提供非法内容时,便逾越“行使编辑职能”的范围,可成立“制作或发展”。^[58]

显然,在 CDA 第 230 条文意允许的范围内,美国司法实务上的主流见解采取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解释。在此种规范模式下,网络中介者有权自订其内容标准,同时又可免于包括诽谤在内的绝大部分侵权法律责任,可尽享 CDA 第 230 条提供之福利,却不必承担国会意欲其承担的自律责任。如此广泛的免责保护事实上并不能有效激励网络中介者开展自律,反而可能制造新的自律抑制,反正自律与否,都不影响免责保护的适用。由此可见,在国会提出的双重立法目的中,美国多数法院显然以维护互联网发展与言论自由为首要考量,尽管也承认激励自律审查为 CDA 第 30 条的立法目的之一,但至少从政策选择的实效上看,并未真正关照到此项立法考量。

四、学界的批评与笔者的观点

对于法院采行上述扩张解释,美国学界一边倒地提出反对。反对者的立论路径主要有两条:

第一,通过探索国会的立法原意,质疑法院全面免除网络中介者责任(主要是散布者责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不少论者认为,国会在 1996 年通过 CDA 第 230 条时无意免除网络中介者的散布

者责任,故齐伦案对230条的理解存在偏差。例如,戴维·R. 谢里登(David R. Sheridan)根据条款文义分析,CDA第230条明定免除的,应仅为“出版者”责任。谢里登认为,“出版者”与“散布者”的分殊在普通法中行之有年,且被普遍承认,齐伦案将散布者附会为出版者,是对传统规则的彻底颠覆,此等重大变更除非国会明言,否则不应做此种理解。^[59]

威廉·E. 比洛三世(William E. Buelow III)提出,国会订立CDA第230条的目的,在于推翻“特拉顿·奥克蒙特诉神童服务公司案”,免除ISP因实施编辑控制而负出版者责任。又鉴于特拉顿·奥克蒙特案与散布者责任无关,故推翻此案不动摇传统诽谤法对散布者责任的规定。若国会真欲取消散布者责任,应同时推翻Cubby公司案。^[60]

安纳玛丽·潘塔齐斯(Annemarie Pantazis)认为,既然CDA第230条的立法目的是促进网络中介者开展自律,为此不惜取消出版者责任,那么据此推理,国会谅必同样鼓励ISP删除不当材料。准此,法院在ISP明知不当材料却未能删除之情状下仍免其责任,岂非有违国会的立法初衷?^[61]安德鲁·M. 塞瓦尼恩(Andrew M. Sevanian)也提出类似观点,他指出,取消散布者责任非但不能激励ISP自律,反而可能制造新的自律抑制,促使ISP对所传递内容的不作为,因为反正自律与否,皆不影响免责保护的适用。^[62]

第二,从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相平衡的角度出发,强调对网络中介者适用近乎完全的免责权将导致法院保护言论自由的尺度过宽,使名誉权无法得到适当保障。如埃米莉·弗里茨(Emily Firtts)指出,全面免除网络中介传播者的侵权责任,违背诽谤法平衡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精神,令诽谤受害者几无求偿机会。^[63]

由这种视角观察,法院对CDA第230条的扩张解释客观上造成互联网上个人名誉的保护程度极低。与这一结果极不协调的是,个人名誉因网络传播而受到的损害,其严重程度与实害性甚至远超过传统媒体的侵害。网络上发表言论限制少、成本低、无把关机制,鼠标轻点,诽谤言论数秒内便传遍全球,可轻易损人名誉。且网络言论一旦发表,可经他人轻松复制、多次发布而迅速蔓延,很难完全删除,从而变成永久的包袱。^[64]受害者虽可在网络上发言澄清事实,矫正虚伪言论,但真相极少能跑赢谎言,自助救济往往效能不彰。就网络诽谤的如上严重性而言,对名誉权给予较低保障的现行制度难具说服力。

理论上,受害人当然可向诽谤言论的始作俑者求偿,但这事实上不易实现。戴维·卢克米尔(David Lukmire)发现,受害人追究诽谤言论表达者的努力往往是担水填井,徒劳无功。他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网络诽谤多以匿名形式发表,表达者可轻易隐身于浩淼无边的网络空间中,经过适当的技术处理,表达者不但可以达到匿名的效果,甚至可以掩藏踪迹,令ISP根本无法追溯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即便ISP能够追查到表达者,受害人也无权直接要求ISP披露其身份,美国有严格的

司法程序确保网络用户匿名发言的权利,受害人必须对匿名表达者提起佚名被告诉讼(John Doe action)^[65],请求法院向ISP发出传票,强制其披露匿名表达者的身份,而ISP也可以申请反对披露。因涉及“匿名发表言论之自由”这一宪法议题,问题益增棘手,原告最终能成功确认匿名表达者身份的几率甚低。再退一步言,即令原告得以确认匿名表达者的身份,也极难在后续诉讼中取胜,即令原告侥幸胜诉,因绝大部分匿名表达者财力有限,原告也未必能成功受偿。^[66]综言之,网络诽谤的受害者常处于极端无助的境地,既无法追究诽谤言论的原始表达者,又不能将责任转加于网络中介者,几乎完全被剥夺获得救济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以上两条论证路径中,第一条路径不能有力驳斥法院的扩张性解释。如前文所述,国会制定CDA第230条的立法目的本身具有双重性。从“好撒玛利亚人”条款的命名和CDA的整体立法背景来看,国会制定该条款的原初意图应为规范互联网上的淫秽、色情等不当内容(与CDA中被宣布为违宪的绝大多数条款不同,230条采取的不是刑事制裁手段,而是更幽微且合宪的取径,即为网站自行处理不当内容提供民事免责权),但为确保CDA第230条能在国会顺利通过,它的起草者又特意提出另一项立法目的以为补强,这项立法目的就是推进互联网产业发展、保障网络意见自由市场的蓬勃生机。所以,CDA第230条立法目的内部即含藏着冲突与竞争。而在这两项立法目的中,法院赋予第二项目的以特别重要性,虽然偏离了CDA第230条的原初目标,却也难谓其完全背离国会的立法目的,因为“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与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确实也是CDA第230条明文规定的立法目的。

比较而言,笔者更服膺于以上第二条论证思路。在笔者看来,CDA第230条及其扩张解释的真正问题在于,它们完全游离于诽谤法调节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框架之外。CDA第230条作为CDA的条款之一,是在管理网络淫秽、色情信息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立法动机与诽谤关系甚微,它不以调节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为己任,未能考量二者的利益协调自然不足为怪。美国法院对CDA第230条的司法解释虽然突破了淫秽色情信息管理的框架,却又走向过度保护互联网言论自由的极端,同样忽略了网络诽谤案件中需与言论自由相平衡的另一项重要权利——名誉权。美国最高法院曾在“格茨诉罗伯特韦尔奇公司案”(Gertz v. Robert Welch Inc.)中强调,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同为重要权利,二者的平衡机制不应只就单一权利面向考量。言论自由固然是自由民主秩序的构造性基础,但个人名誉事关为人的资格,也断不可轻忽。“因一个人保护其名誉免于不当侵犯和伤害的权利,恰恰反映了我们所秉持的有关每一个人不可或缺之尊严和价值的基本信念——此一信念根植于任一正当有序的自由制度之中。”^[67]但美国下级法院在审理网络诽谤案件时,将最高法院的此番告诫弃置一旁,标尚言论自由,却对名誉权略无顾及。

基于此,美国网络诽谤领域的立法亟须重新回归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价值调整的思考面向,为网络中介者慎重设计适当的规范架构和具体措施,力图在言论自由与

名誉权保障求取更佳平衡,同时确保不对网络中介者施加过大压力。为此,学界提出多种替代性方案,其中呼声最高、应者最众的是以下两项方案:

方案一:恢复普通法的散布者责任。

有不少论者主张回归传统诽谤法的散布者责任。^[68]这种主张认为,避免网络中介者承担过重的责任,并不意味着不负任何责任,必要的管制并不必然违反言论自由的保障,而是对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适当调节。散布者责任较出版者责任为轻,它不要求网络中介者对所传输信息承担普遍的审查义务,只需对侵权事实尽一般注意义务即可,或许会对网络中介者造成一定压力,但并非“过度”的负担。且适用散布者责任标准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侵权责任。原告在诽谤诉讼中承担沉重的举证责任,除须证明被告明知或应知诽谤内容以外,还须证明名誉侵权行为成立的各项要件,这对原告而言显非易事,故原告胜算不大。概言之,开放散布者责任,并不会自动导致判决结果有利于原告。

不过,恢复散布者责任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其中最棘手的就是,网络中介者是否有能力区辨、判断诽谤言论?将这样一个即便对法院而言也十分烦难的问题交由非法律专业人士的网络中介者,是否可能造成过高的负担,从而导致网络中介者为求自保而对受到投诉的争议性言论一概予以限制?鉴于散布者责任在网络语境中的适用确实可能带来现实的寒蝉效应,若果真恢复散布者责任,美国的立法与司法机构可能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并需要适度调整“被告明知或应知诽谤内容”这一待证事实的认定基准,至少应考量互联网环境与传统环境的差异,不能对每日传递海量信息、接到各种投诉的网络中介者适用与书店或图书馆相同的标准,不应仅凭网络中介者有技术能力扫描链接网页,或曾收到诽谤投诉,便率然认定其明知或应知诽谤内容。

方案二:借鉴《数字千禧年版权法》的“通知-撤下”制度。

也有一些论者主张借鉴1998年《数字千禧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简称DMCA)第512条的“通知-撤下”(notice-and-takedown)制度,以回避散布者责任给网络中介者带来的诽谤认定问题。^[69]根据该制度,网络服务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在接到权利人符合特定要求的书面侵权通知后,必须迅速移除争议材料或断开链接,始能免除责任。^[70]为防止错误通知,DMCA还特别设置“反通知”(counter notification)程序,规定服务提供者在实施撤下行为后,须将“撤下”结果告知发布争议材料的用户。若用户认为所涉材料并未侵权,可向ISP发出反通知,要求其恢复撤下材料。服务提供者须再将反通知书转达于权利人,告知将在10个工作日内恢复撤下材料。^[71]经过此番程序,服务提供者即可安住于中立地位,置身于具体争议之外。

若在网络诽谤中采纳“通知-撤下”制度,无疑能消除网络中介者判断诽谤内容的负担。同时有利于受害者恢复名誉,因为对于受害人而言,最重要的救济可能

并不是损害赔偿,而是排除侵害。此外,反通知制度理论上也观照到言论自由的保障,为表达者提供了抗辩机会。由此观之,“通知-撤下”制度堪称能兼顾各方利益的良好政策。但丽贝卡·塔施内特(Rebecca Tushnet)在DMCA的适用过程中观察到,绝大多数用户在收到撤下通知后并不会做出抗争,有一项调查表明,在47000起案例中,发起反通知的个案只占0.009%,可见反通知制度事实上无法按其预计发挥作用,网络中介者在控制侵权用户时常会殃及无辜用户。加之DMCA的避风港设计并不鼓励ISP对侵权争议开展调查,故“通知-撤下”程序在现实中很可能盲目压制重要言论,客观上造成与寒蝉效应相同的果效。^[72]如此看来,若直接在诽谤法领域移植“通知-撤下”程序,确实能够扭转名誉权保护不利的局面,但同时也可能矫枉过正,不利于网络言论的自由抒发。网络诽谤领域的制度建构如何根据现实情况,在借鉴“通知-撤下”制度时做出适当调整,以便更合理协调各方利益,可能是后续需要重点论证的课题。

以上两项改革方案主要针对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相对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的ISP,它们对用户发动的侵权行为一般不知情,所以即便不能完全免责,也应对其责任加以适当限制,不宜课以“出版者”责任。但如果中介传播者是ICP,则情况又有所不同。按法院目前对230条的司法解释,ICP在主动张贴、转载第三人诽谤内容时也可无差别地享受免责保障。在笔者看来,这种扩张解释至为不妥,ICP与单纯提供网络服务与空间的ISP相比,在参与传播侵权内容时通常更为主动,对言论内容也具有更高的筛选管控能力,所以当网络中介者为ICP时,应衡酌具体案情,如果ICP主动发布第三人言论,且具有高度编辑控制权,则不能仅因言论出自第三人即免除其责任,仍应以出版者身份确定其责任。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 [1]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者的范围大于ISP,因交互式计算机网络不止互联网一种形式。但鉴于互联网是最典型、最主要的交互式计算机网络,故美国司法界与学术界常将二者互用,按此惯例,本文在行文上也不做特别区分。
- [2]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1964).
- [3] 此为美国诽谤法类型化归责体系的粗简概括,除原告身份以外,系争言论是否关涉公共事务也是考量要素,据此有更复杂的类型划分法。参见张金玺:《论美国诽谤法之类型化归责体系》,《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8期,第28-32页。
- [4] 参见〔美〕美国法律研究院,《侵权法重述第二版:条文部分》,许传玺、石宏、和育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第558节。另须说明的是,原告无须证明特别损害的情形有:(1)原告可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2)诉讼类型为非关公共事务的私人诽谤案件。See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349 (1974), *Dun&Bradstreet Inc. v. Greenmoss Builders, Inc.*, 472 U. S. 749, 755-761 (1985)。

- [5] Cianci v. New Times Pub. Co. , 639 F.2d 54, 61 (1980).
- [6] [美] 美国法律研究院:《侵权法重述第二版:条文部分》,许传玺、石宏、和育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 [7] Smith v. California, 361 U.S. 147 (1959).
- [8] Smith v. California, 361 U.S. 147, 153-154 (1959).
- [9] Cubby, Inc. v. CompuServe, Inc. , 776 F. Supp. 135 (1991).
- [10] Cubby, Inc. v. CompuServe, Inc. , 776 F. Supp. 135, 137 (1991).
- [11] Cubby, Inc. v. CompuServe, Inc. , 776 F. Supp. 135, 140 (1991).
- [12] Cubby, Inc. v. CompuServe, Inc. , 776 F. Supp. 135, 140-141 (1991).
- [13] Cubby, Inc. v. CompuServe, Inc. , 776 F. Supp. 135, 141 (1991).
- [14] 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 23 Media L. Rep. 1794 (1995).
- [15] 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 23 Media L. Rep. 1794, * 7 (1995).
- [16] 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 23 Media L. Rep. 1794, * 10 - * 11 (1995).
- [17] 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 23 Media L. Rep. 1794, * 12 - * 13 (1995).
- [18] 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s Co. , 23 Media L. Rep. 1794, * 13 - * 14 (1995).
- [19] Reno v.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521 U.S. 844 (1997).
- [20] “Federal District Court Denies § 230 Immunity to Website that Solicits Illicit Content—FTC v. AccuSearch, Inc. ,”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21, No. 8, 2008, pp. 2253.
- [21] “好撒玛利亚人”语出《圣经·路加福音》中耶稣所讲的故事:一犹太人被打劫身受重伤,有犹太人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不闻不问,惟有一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好心相助,后以“好撒玛利亚人”指代“行善人”。美国大多数州制定有“好撒玛利亚人保护法”(good-Samaritan law),使那些对处于紧急危险中的他人自愿施予救助,但又在救助中导致他人伤害者得以免除责任。CDA 此处使用“好撒玛利亚人”概念,意在肯定网络中介者对不当内容的筛选、限制为良善行为,应给予免责保护。
- [22] 47 U.S.C. § 230 (c) (1), (2).
- [23] 47 U.S.C. § 230 (f) (2).
- [24] 47 U.S.C. § 230 (f) (3).
- [25] CDA230 条的适用范围颇广,适用于著作权、隐私权以外的广泛侵权领域,但虑及本文议题关涉网络诽谤,故对法条内容的阐释以及后文的案例分析将主要围绕名誉权问题展开。
- [26]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use Conference Report on Telecommunications Act (H.R. Rep. No. 104-458), Jan. 31, 1996, p. 194. <http://www.gpo.gov/fdsys/pkg/CRPT-104hrpt458/pdf/CRPT-104hrpt458.pdf>, 2012年8月16日。
- [27]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47 U.S.C. § 230 (b) (1), (2).
- [28]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47 U.S.C. § 230 (a) (1), (3), (4), (5).

- [29]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1997).
- [30]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329 (1997).
- [31]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330 (1997).
- [32]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329 – 330 (1997).
- [33]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331 (1997).
- [34]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330 (1997).
- [35]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331 (1997).
- [36]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332 – 333 (1997).
- [37]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129 F.3d 327, 333 (1997).
- [38] *Blumenthal v. American Online Inc.*, 992 F. Supp. 44 (1998).
- [39] *Blumenthal v. American Online Inc.*, 992 F. Supp. 44, 46 (1998).
- [40] *Blumenthal v. American Online Inc.*, 992 F. Supp. 44, 47 (1998).
- [41] *Blumenthal v. American Online Inc.*, 992 F. Supp. 44, 51 (1998).
- [42] *Blumenthal v. American Online Inc.*, 992 F. Supp. 44, 51 – 52 (1998).
- [43] *Batzel v. Smith*, 333 F.3d 1018 (2003).
- [44] *Batzel v. Smith*, 333 F.3d 1018, 1020 – 1022 (2003).
- [45] *Batzel v. Smith*, 333 F.3d 1018, 1030 – 1031 (2003).
- [46] Melissa A. Troiano, “The New Journalism? Why Traditional Defamation Laws should Apply to Internet Blogs,”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55, No. 5, 2006, pp. 1460 – 1462.
- [47] *Batzel v. Smith*, 333 F.3d 1018, 1031 (2003).
- [48] *Batzel v. Smith*, 333 F.3d 1018, 1033 – 1034 (2003).
- [49] *Batzel v. Smith*, 333 F.3d 1018, 1035 (2003).
- [50] 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就案件做出终局判决后，原当事人间不得就同一事项、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请求再次提起诉讼。
- [51] *Batzel v. Smith*, 372 F. Supp. 2d 546, 556 (C. D. Cal 2005).
- [52] 也有个别法院反对近乎绝对的扩张解释，如加州一家上诉法院在“巴雷特诉罗森塔尔案”(*Barrett v. Rosenthal*)中主张对 230 条采取限缩解释，只限制追究出版者责任。见 *Barrett v. Rosenthal*, 114 Cal. App. 4th 1379, 1392 (2004)。但此判决后被支持全面免责权的加州最高法院推翻。见 *Barrett v. Rosenthal*, 40 Cal. 4th 33, 63 (2006)。
- [53] *See Global Royalties, Ltd. v. Xcentric Ventures LLC*, 2007 U. S. Dist. LEXIS 77551 (D. Ariz., 2007).
- [54] *See Barrett v. Rosenthal*, 40 Cal. 4th 33 (2006).
- [55] *See Parker v. Google, Inc.*, 422 F. Supp. 2d 492 (E. D. Pa. 2006).
- [56] *See Ben Ezra, Weinstein and Company v. American Online Inc.*, 206 F.3d 980 (10th Cir. 2000).
- [57] *See Carafano v. Metrosplash. com, Inc.*, 339 F.3d 1119 (9th Cir. 2003).
- [58] *See Fair Housing v. Rommates. Com*, 521 F.3d 1157 (9th Cir. 2008).
- [59] David R. Sheridan, “*Zeran v. AOL* and the Effect of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 Decency Act Upon Liability for Defamation on the Internet," *Albany Law Review*, vol. 61, no. 1, 1997, p. 168.
- [60] William E. Buelow III, "Re-establishing Distributor Liability on the Internet: Recogniz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raditional Defamation Law to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of 1996," *West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16, no. 1, 2013, pp. 346 - 347.
- [61] Annemarie Pantazis,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Insulti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from Defamation Liability," *Wake Forest Law Review*, vol. 34, no. 2, 1999, p. 550.
- [62] Andrew M. Sevanian,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A 'Good Samaritan' Law Without the Requirement of Acting as a 'Good Samaritan'," *UCLA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vol. 21, no. 1, 2014, p. 137.
- [63] Emily K. Fritts, "Internet Libel and the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How the Courts Erroneously Interpreted Congressional Intent with Regard to Liability of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Kentucky Law Journal*, vol. 93, no. 3, 2005, p. 784.
- [64] S. Elizabeth Malloy, "Anonymous Bloggers and Defamation: Balancing Interests On the Internet,"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84, no. 5, 2006, pp. 1192 - 1193.
- [65] 佚名被告诉讼为原告不知被告真实姓名的情况下,以“无名氏”为名提起的诉讼。
- [66] David Lukmire, "Can the Courts Tame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The Reverberations of Zeran v. America Online," *NYU.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vol. 66, no. 2, 2010, pp. 402 - 403.
- [67]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341 (1974).
- [68] See e. g. David R. Sheridan, "Zeran v. AOL and the Effect of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Upon Liability for Defamation on the Internet," *Albany Law Review*, vol. 61, no. 1, 1997, pp. 151 - 152; Annemarie Pantazis, "Zeran v. American Online, Inc: Insulti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from Defamation Liability," *Wake Forest Law Review*, vol. 34, no. 2, 1999, p. 555.
- [69] See, e. g., Olivera Medenica & Kaiser Wahab, "Does Liability Enhance Credibility?: Lessons from the DMCA Applied to Online Defamation,"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vol. 25, no. 1, 2007, pp. 265 - 266; David E. Hallett, "How to Destroy a Reputation and Get Away with It: The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Examined: Do the Policies and Standards Set Out in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Provide a Solution for a Person Defamed Online?" *IDEA: The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 41, no. 2, 2001, pp. 260 - 261.
- [70] 17 U. S. C. § 512 (b) (2) (E), (c) (1) (C), (d) (3).
- [71] 17 U. S. C. § 512 (g) (2).
- [72] Rebecca Tushnet,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 Intermediari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76, no. 4, 2008, p. 1003.

marketing for 2013 Voice of China in layers, in order to study their effect on WOM ripple effect in microblogs. It uses the sender, recipient, word of mouth information as three main variabl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ffect of WOM re-transmitting in microblogs is composed of both the width and the length of the ripple effect. In social media (such as microblogs),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ntity of sender and information's first re-transmission. "Search will" is not the main reason for WOM to be re-transmitted. The influence from the identity of the recipient over the WOM re-transmitting in microblog can be negligible. "Express opinions" and "release emotion" is the main re-transmitting will.

58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Communicators of China on Twitter

· *Xiang Debao*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itter's communicators of public opinions on China and their influence with an empirical methodology. This paper finds that with respect to individual users, organization users are dominant forces on Twitter generating public opinions about China. Interest groups, media, enterpris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re the main types of organization users. Media organizations, particularly commercial media, play a large role in opinions of China on Twitter. In terms of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cators mainly have four to six years of microblog use history. The total average tweet number for all communicators is 7429, and the average tweet number for each user is 4. Most users come from the US, Canada, China,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Media professionals are the main occup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ors in public opinions of China. In terms of influence, individuals' are higher than the organizations. Among individual users, media practitioners have a high influence and are active. Traditional media holds the highest influence among organization users.

70 A Research on the Defamation Liability of Online Intermediaries in America: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of 1996 and Its Judicial Application

· *Zhang Jinxi*

The law of defamation has evolved as a war between a plaintiff's right to reputation and a defendant's right to free speech. To balance these two rights in the cyberspace is a world-wide challenge. Internet defam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defam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world, for the defamed can hardly identify the original speakers. This situation results in a problem unique to Internet defamation: should online intermediaries involved in defamation communication be held liable for third-person information? How should they take the liability? This article offer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opinions on this issue, as well as critiques from legal scholars. It highlights the harmful consequences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and emphasizes the need to protect persons from irreparable harm to reput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defamation law.

88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 Kung Pao* and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 Yu Fan, *Sun Xiaol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 Kung Pao* and the Nanjing government led by Chiang Kai-shek is always a heated subject i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However, while Chiang Chi-luan, Hu Zheng-zhi and Wang Yun-sheng are often the focus of relevant studies, Wu Ting-chang, one of the Big Three creators of the newspaper, fails to be paid sufficient attention by scholars. In fact, according to Wu's colleagues, Wu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tance and strategy of *Ta Kung Pao*. Moreover, the Chiang Kai-shek Archive proves that Wu interacted actively with Chiang via *Ta Kung Pao* on many issues, including the Rehe Incident, Fujian Incident and North China Incident, to support Chiang's policies, which accounts for his quick promotion as a non-core member in Chiang's government.

106 Reports by Popular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n Tibet in America before 1946: A Case Study on *The New York Times*

• Tuo Chaoqun, *Han Liang*

Reports on Tibet by popular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America were deeply concerned with American explorations into Tibet before 1946. Through summarizing features of the explorations and probing the motives and effects of the reports on Tibet b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by analyzing its media discourse right, text types and content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American reports on Tibet experienced transitions from using European sources to independent reporting; and from communications of general information to a strengthening of media positions.

119 Meaningfully Ambiguous: on the Categorization and Naming of Written Reports' Genres

• Wang Chenyao

英文编辑 段铁铮